

#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医疗卫生领域的群众动员

郑志锋

(福建中医药大学 思政部,福建 福州 350122)

**[摘要]**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医疗卫生领域的群众动员,是将“医疗卫生需要群众”和“群众需要医疗卫生”作为出发点和立足点,通过有目的有组织的发动,不断发掘群众力量,并以制度化的方式有序推进。在这一过程中,真心为群众着想、切实维护群众利益,并使群众在卫生运动中直接受益,成为撬动群众热情的真正“杠杆”。

**[关键词]**土地革命战争;医疗卫生;群众动员

**[中图分类号]**K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17X(2017)02-0051-07

## The Mass Mobilization in the Field of Medical and Health Care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Agrarian Revolutionary War

ZHENG Zhifeng

(Depart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Teaching and Research,  
Fujian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Fuzhou 350122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Agrarian Revolutionary War, the mobilization of the masses in the medical and health field was the starting point and foothold of "the medical health care needs the masses" and "the masses need medical and health care". Through purposeful and organized mobilization, the masses were continuously explored and institutionalized, and advanced in an orderly manner. In this process, to work really for the sake of the masses, earnestly safeguard the interests of the masses, and directly benefit the masses in the health movement, has become the real "leverage" to lever the enthusiasm of the masses.

**Key words:** The Agrarian Revolutionary War; medical and health care; mass mobilization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普遍被认为是群众路线形成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党在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为群众谋利益等方面有许多具体做法与经验教训,从中亦可考察党群或政群关系的双向互动。已有的相关研究还主要着眼于群众路线在工农武装发展、根据地经济建设等方面的实践,而对于医疗卫生领域的专门研究仍付阙如。本文拟对此问题作一探析。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医疗卫生是工农红军行军作战和根据地建设中一项极其重要且系统的复杂工作,动员群众是在当时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实现基

本医疗卫生保障的重要法宝。中国共产党和根据地政权一方面积极宣传发动,另一方面切实维护群众的健康利益,并逐步形成一定的制度,有力地把群众纳入红军和根据地的医疗卫生工作体系中去。

### 一 根据地卫生工作中的群众观点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医疗卫生工作,一方面必须解决红军士兵的伤病问题和部队卫生,另一方面要推动根据地的防疫卫生。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红军部队的医疗卫生离不开群众的支持。同时,根据地群众的生存与发展也需要医疗卫生工作的开

收稿日期:2016-09-08

作者简介:郑志锋(1975-),男,福建永春人,福建中医药大学副教授,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史。

展。因此,在根据地的卫生建设过程中,既要争取群众和依靠群众,也要注意满足群众的卫生需求。

依靠群众,首先是基于对红军发展和根据地建设与群众之间鱼水关系的深刻认识。马克思认为:群众作为历史活动的主体,其队伍必将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开展而不断发展壮大。<sup>[1]</sup>中国革命的成功离不开广大群众的支持,“有很好的群众”<sup>[2]57</sup>是革命武装和革命根据地存在并发展的重要前提条件。在红色政权初创时期,国民党军四面包围,物资短缺,给养困难。工农武装割据的给养问题既关系根据地群众的基本生存保障,其解决又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群众的支持。在卫生工作中,还要更加突出群众的主体作用,因为医疗卫生服务既是革命给养的重要方面,又是群众不可或缺的现实需求。

1. 军医方面。在工农红军的初创阶段,以红四军为例,团卫生队和游击区边界的休养所是为红军伤病员提供卫生医疗服务的重要机构。在休养所的设立上,其“唯一的条件要四面有群众组织及武装的拥护”,<sup>[3]8</sup>“压迫工农是红军最重的犯罪”<sup>[3]18-19</sup>已成为红军的共识。1929年12月,中国共产党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指出了红军后方医院蛟洋医院的缺点,其中包括“与当地群众关系不良,以致伤病兵看医院如牢狱,不愿留在后方”。<sup>[4]831</sup>决议要求蛟洋医院应该有计划地纠正缺点,还应该在闽西工农群众中发起募捐,密切工农群众与红军的联系。随着队伍的发展,药品和医生不足的问题越发突出,利用当地的医生和药材资源是有效解决部队医疗卫生问题的重要出路。<sup>[3]8</sup>因此,如何动员一切可以利用的医疗人才资源是关系部队医疗卫生工作能否顺利进行的重大问题。同时,医疗用品的解决很大程度上也是来自于群众。1929年9月28日,《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明确指出:“对于需用品可渐次做到由群众路线去找出路,红军自己办固然好,但同时要能由群众供给与募捐才能建立红军与群众的更密切关系”。<sup>[4]485</sup>这是红军部队对“一切依靠群众”重要性的较早认识,对解决红军士兵伤病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医疗资源非常紧张,医疗卫生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医患之间的医务关系,它关系到工农武装的发展和根据地政权的存亡,甚至关系中国革命事业的命运。因此,发动群众是红军医院的一项重要政治工作。1932年1月总政治部制定了《中国工农红军医院政治机关工作暂行条例》,

为医院政治机关的工作内容进行了规范性指导,其中包括“计划与组织发动地方党、政府及群众团体对伤病人员的慰劳工作”。群众政治工作也是对医院工作检查的一项重要内容。1934年7月10日总政治部发布了关于医院政治工作的训令,针对医院政治工作存在的问题作出了一系列指示,最后着重指出:“必须把医院政治工作的基础建筑到群众中去,……经过支部来领导群众完成医院的任务”。<sup>[5]196</sup>可见,即使是在专业化程度较高的医疗卫生领域,党和根据地政权依然视群众为重要依托。

2. 根据地卫生方面。1932年初,闽西、江西富田等地发生的传染病疫情,其较强的传染性和较高的致死率,<sup>[6]</sup>引起了党和军队的高度重视。中央认识到瘟疫将会是一个有可能被忽视却事关苏区命运和革命发展前途的重要问题,必须发动群众力量与瘟疫作斗争。1932年3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发布第2号训令,号召“强固阶级战争的力量实行防疫的卫生运动”。训令提出瘟疫问题不是一个普通的问题,“如果发展起来是非常危险的,对于工农群众的健康和生命有莫大的危害,尤其是对于发展阶级战争的力量损失”。因此,训令要求“各级政府需领导工农群众来执行这一条例”(《苏维埃区暂行防疫条例》)中各种办法,尤其是向广大群众作宣传,使工农群众热烈的举行防疫的卫生运动,使瘟疫不至发生,已发生的迅速消灭,以强固阶级战争的力量,好更有力地向外发展”。<sup>[7]81</sup>“向全苏区内一切污秽和疾病作斗争”成为巩固苏区和发展苏区的一项重要内容,“这就需要苏区群众贡献出全部的体力与精力”。<sup>[5]71</sup>在中央的重视和推动下,群众卫生工作成为各根据地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如1933年4月15日福建省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团通过的《对内务部目前工作的决议》将领导群众卫生运动作为内务部的主要工作之一,提出“加紧领导广大工农劳苦群众深刻去了解卫生是保护健康的唯一办法”。<sup>[5]80</sup>又如湘赣省永新县苏维埃在同时期通过的《卫生防疫问题决案》中,群众是卫生防疫宣传工作的主要对象,是卫生防疫竞赛的主要参加者,是环境卫生行动的具体行为人为人。

根据地政权将群众视为根据地卫生工作的主体,并通过群众团体,实现了党和根据地政府的卫生工作方针政策与每个工农群众行动的结合。1933年3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内务人民委员部颁布了《卫生运动纲要》,纲要明确提出

“卫生运动是广大群众的”，“是靠着工会、贫农团、少先队、赤卫队、妇女代表会、儿童团、俱乐部、夜学、小学等等群众团体和机关去动员和广大群众一齐动手，而不是靠着少数政府人员去做的”。<sup>[5]78</sup>在具体的落实中，群众团体在根据地各区、乡的卫生宣传、卫生检查、卫生竞赛和评比等各项活动中成为主要的推行者。如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卫生管理局的卫生工作计划中明确规定：“要使每个城市的群众团体能够了解卫生知识，而且要使这些群众团体成为在群众中起卫生教育的核心作用”。<sup>[5]126</sup>在永新县苏维埃以区乡为单位举行的卫生防疫竞赛中，“由县苏卫生部按期订出竞赛条约颁布各乡群众团体执行，定期检阅评判”。<sup>[5]83</sup>群众团体在根据地群众性卫生运动中既是桥梁也是主体。

## 二 “群众化的方式”中不乏制度化的倾向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群众化的方式”已成为一种重要的工作方法。群众运动的表现形式，被认为可能“以民主的形式颠覆理性的制度安排”。<sup>[8]244</sup>但在当时医疗卫生工作中，群众动员却表现出了一定的制度化倾向。

1. 军队卫生制度方面。1933年9月18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卫生部颁布了《连一级卫生勤务（卫生员工作大纲）》，从总则到具体的卫生行政工作规定都涉及群众问题。在工作性质与定位上，大纲明确“卫生工作是广泛的群众运动，必须是用政治鼓动说服精神十分耐烦的深入在群众中去工作，使每个群众都能了解卫生的意义，自动的讲求卫生”。<sup>[9]14</sup>在卫生行政工作的第一条规定，对于上级卫生机关的指示和文件必须“发动群众彻底的全部执行”。在卫生教育上，要“适合群众的兴趣”。在卫生宣传上，要善于“组织群众”。同时颁布的《师以上卫生勤务纲要》规定：“要用突击式的、个别的深入的谈话与考察中取得全体群众所能供给的材料，要以客观的事实去分析与判断各种现象”。<sup>[9]19</sup>因此，大纲所设计的巡视问题中突出了对群众的关注。如：“卫生员是否在政治动员之下，广泛的号召群众起组织性的进行卫生工作？”“群众对卫生情绪怎样？能否注意卫生？”“党团员在群众中作用怎样？”“与当地群众的关系怎样？是否有脱离群众的事？”<sup>[9]20-21</sup>这些问题实际上反映了当时卫生工作与群众之间的双向互动：卫生工作离不开群众的支持；群众的也离不开卫生工作的保障。

2. 根据地卫生制度方面。1932年3月，《苏维

埃区域暂行防疫条例》规定：“防疫范围以区为单位由政府领导各乡群众团体执行”，从环境卫生清洁到传染病的处置再到饮食卫生的注意等具体问题，大多是以群众作为主体。群众防疫的实现，关键是要提高群众的认识。因此，条例最后将群众性的卫生宣传作为各级政府和红军卫生机关的重要工作内容。为了推动防疫条例的具体落实，《苏维埃暂行防疫条例》专门附录了《卫生运动指导员工作纲领》。纲领将群众团体人员作为卫生运动组织领导的基本力量，并以具体的家庭户作为落实的基础，“凡城市、圩镇须组织卫生运动组以十家至十五家组合组织，公推组长一人，管理并监督本街本组内的卫生事项”。<sup>[9]142-143</sup>《卫生运动纲要》专列“群众应该怎样讲卫生”一目，从疾病的来源和卫生的方法两方面进行具体的技术指导，并提出了群众卫生运动的组织、宣传、卫生竞赛、卫生运动日、卫生检查等做法。《纲要》最后指出，苏区的卫生运动是依靠广大群众一齐动手，“不是单单靠着少数政府人员去做的”；卫生运动的方式“是要依据每时每地的实际情况去做具体的布置与切实的行动，而不是依靠官僚主义的一纸通令或一个决议案的”；卫生工作的落实“是靠着普遍的与经常的宣传鼓动，使群众了解高兴，自己动手，而不是靠着强迫和命令”。<sup>[5]70-78</sup>

在党和根据地政权的宣传发动和一系列条例、制度的规范指导下，根据地群众有组织、有序地参与到红军部队和根据地的医疗卫生工作中去，成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医疗卫生工作的一支重要力量。

## 三 群众参与医疗工作的广泛性及显著成效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和根据地政权在扩红优红、生产支前、查田土改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的群众动员。在医疗卫生工作领域，生命健康的正相关和救死扶伤的道德性，使群众的参与面更加广泛，参与成效更加显著。

工农红军和根据地的医疗条件十分落后，医生不足，药品短缺，伤病问题的解决，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广大群众的鼎力支持。首先是许多民间的医务工作者被动员起来加入到红军和根据地的医疗卫生工作中来。如闽西的傅连璋，“一位享有声誉、过着优裕生活的基督教会医院院长，却自愿过着艰苦生活和冒着生命危险”，<sup>[10]1</sup>为党和红军的医疗卫生

工作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又如闽东苏区很多私人开业医生被动员起来为红军服务,他们不顾个人安危,长途跋涉,为分散在群众家中的伤病员进行及时的救治,有的甚至因此付出了宝贵的生命。

<sup>[11]331</sup>在特殊的革命战争环境中,“医院无论到哪里都不能脱离群众,不能损坏群众一草一木一针一线的利益,还要经常解决群众中无劳动力的生活问题或疾病问题,也从群众中实习些生活经验或学习土办法治病。这样互相帮助和学习,到敌情紧张时,群众会主动帮助转运伤兵或做掩护工作”。<sup>[12]312</sup>因此,虽然没有医疗卫生方面的专业知识,但普通群众也被广泛动员起来,力所能及地支持红军医院的诊疗工作,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主要表现在:

1. 为红军医院的创办添砖加瓦。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部队的后方医院大多是利用农村根据地民房因地制宜建立起来的,这离不开当地群众的慷慨付出。如闽西蛟洋医院的建立就是选取了“党和群众的基础比较好,群众觉悟比较高,跟党和红军有深厚的革命感情”的地方作为红军医院的驻地。设立红军医院的消息一传到蛟洋,“全村的干部、群众立即行动了起来,有的准备米菜,有的送来柴火,有的安置床铺。他们腾出了七座平房,打扫得干干净净,把门板、木板放在木椅子上搭成床铺再加铺几寸厚的干稻草。木板不够,就把稻草铺在地上。一切都安排停当了,只等亲人到来”。<sup>[13]130</sup>

2. 协助处理医院杂务。红军医院人手紧张,医院的其他杂务大多是靠当地群众的热情参与。“他们上山砍柴,送给医院,还帮助烧火煮饭菜,妇女则组织了洗衣队帮助伤病员洗衣服、被子、毯子。当地理发师也常为伤病员理发”。<sup>[13]131</sup>

3. 承担伤病员的转移、掩护、疗养工作。各地群众组织了担架队,负责运送伤病员,为前线的红军部队解决了输送伤病员的问题。当敌人进攻,医院撤退时,还是群众承担起了保护伤病员的工作。<sup>[14]316-317</sup>

4. 慰劳伤病员。战争损伤、病痛折磨对于伤病员来说,不仅需要肉体上的医治,也需要精神上的慰藉和鼓励。根据地群众在慰劳伤病兵方面充当了最为主要的角色。“抬送伤员时,一路上,各个村子都组织了慰劳队,担架队一到,用哨子一吹,慰劳队都来了,送茶给他们喝,送点心,送鸡蛋给他们吃,给伤员喂饭,还帮助洗衣、补衣等等,那就像到了家里一样”。<sup>[15]399</sup>

5. 为红军医院提供药材、食品等物资。红色根

据地时常处于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下,药材匮乏,食品短缺。当地一些药店帮忙四处采购,群众也是长途跋涉上山采药,不辞辛劳地制作担架等简便的运送病员的器材。如湘赣苏区的黄岗医院,在敌人严密封锁食盐时,“发动群众,想方设法,收集寻找硝盐,用水熬的办法,一点一点的把硝和盐分离开”,<sup>[16]1130</sup>不仅解决了医疗用盐,也解决了医院工作人员的食盐困难。

根据地群众对红军部队医疗卫生工作的热情支持,减轻了红军医院的人力物力负担,也是对红军战士精神上的激励。红军三十军军医院政治部主任董洪国的工作回忆列举了医院洗衣队的八项工作:(1)护理伤病员细心周到,被休养员称为贴心人;(2)是医院粮食加工的能手;(3)是一支坚强的运输队;(4)是一支不怕艰苦的担架队;(5)做好敷料室的消毒工作;(6)给伤病员洗衣、补衣,使他们整洁、干净上前线;(7)协助做好炊事工作;(8)经常给伤病员整理病房床铺。<sup>[17]445-448</sup>洗衣队的女同志们在当时艰苦的环境中付出如此大的心血和体力,其中所包含的是她们对革命事业的极大热情和支持,这对于伤病战士们也是一种精神感染。

#### 四 群众利益的平衡

争取群众、依靠群众必须以不损害群众的利益为前提,这在当时虽然已是红军和苏区群众的共识,但在具体过程中的利益平衡并非易事。从长远来看,当时的革命与战争符合群众的根本利益,但群众对战争与革命的直接利益付出也是现实存在的。因此,在进行宣传动员的同时,不能忽略群众现实、具体的利益。医疗卫生领域的群众动员相对有效地实现了这种利益的平衡。

红军部队的医疗卫生工作需要工农群众的人力物力支持,但并不是单向的一味索取。红军给养的补充,打土豪等筹款方式是重要渠道,但并不能随意而为之。“一定要经过群众路线,在最短促时间中也要注意这一工作方式的运用”;“筹款标准,主要是不要侵犯工农及小有产者的一般利益”。<sup>[4]485</sup>在红军早期的医疗工作中逐渐形成了良好的军民互动模式。一方面,利用有限的医疗资源为群众服务。“群众有病,可以免费到医院治疗,医官都乐意为群众诊治。群众在夜深之时,如有疾病,医官们也能连夜赶往抢救”。<sup>[13]132</sup>另一方面,注意保护群众的利益。伤病员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随便拿群众的一分一厘。

红军医院在群众的支持下得以顺利地为伤病员医治伤病,同时它也把回馈群众、始终保持与群众的良好关系作为重要的工作任务之一。如积极为群众治病,“随到随看,热情相待,凡是有苏维埃政府介绍信的贫苦群众,一律免费治疗”,<sup>[18]421</sup>同时还给儿童种牛痘,向群众宣传卫生知识;帮助群众生产,在农忙时节抽出干部、战士帮助当地农忙抢收抢种;解决群众困难;在蔬菜、粮食等供应上自己动手,尽量减轻群众负担。<sup>[19]436-437</sup>红军医院与群众的良好关系也逐渐成为当时人们的共识,破坏这种关系的行为或现象会受到批评。1932年9月,十二军军医处的一位医生就是因为对一位患病的马夫摆官僚架子,不管不顾,于是被以“十二军军医处的医生充满了军阀军队的陋习”的标题刊登在《红色中华》的“突击队”栏目,受到公开的批评。<sup>[20]</sup>著名的红军医生傅连璋在回忆当时的工作时深刻地描述了军医与群众的这种关系:“我们在红军内有许多医药问题。我们的问题不仅仅是去照顾红军和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如果只是这个问题,那是比较容易解决的。但是我们无论到什么地方去,住在什么地方,我们还必须照顾当地的一切居民。在旧的统治下,这些地方的人民从没有得到任何无报酬的医疗。他们有各种各样的疾病,所以我们的医院马上成为周围居民的公共医院了,而且他们的需要比我们红军和政府还要大些。我们的医生和药品马上给人民服务,有时为此而不得不牺牲我们对红军的照顾。”<sup>[21]</sup>

群众对红军医疗卫生工作的有形支持主要是在人力和物力两个方面。从人力上看,医生、护士是紧缺而又急需的专业技术人才,同时大量的后勤保障人员如厨房、洗衣队、担架队、运输队等共同构筑了红色医院的人力保障。从群众中吸引这些人员相对稳定地参与到红军医疗卫生工作中来,除了宣传动员外,还需要有实质性和制度化的鼓励措施。如《鄂豫皖区苏维埃政府优待医生条例》对愿意加入红军和根据地医疗卫生事业的医生,在其政治和生活待遇上,在家属的耕作、子女教育、医疗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优惠条件:

一是保证医生的政治待遇。愿意在苏维埃政府注册的医生,无论其过往的经历如何,只要他现在没有加入反动政治派别,忠实于他所从事的医务工作,并遵守苏维埃的法令,就能够与苏维埃的公民享受同等的待遇。

二是满足医生的生活需求。对于来自国民党

统治区的医生,包括其带到苏区的家眷或在苏区新成立的妻室儿女,苏维埃政府尽量维持他们的生活;在苏区革命机关中进行医疗服务的医生,苏维埃政府按规定每月发给适当的薪金;外地来的医生,其居住房屋由苏维埃政府分配,并免缴租金。

三是赋予医生家属一定的经济权利。在苏区的土地分配中,医生的家属如果愿意耕种,能够享有分配土地的权利。

四是在教育医疗方面对医生子女进行优待。医生的子女,可以到苏维埃创办的学校接受免费教育,可以享受苏维埃医院的完全免费医疗服务。<sup>[22]</sup>

此外,群众对红军医疗卫生工作的支持和付出,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他们自身家庭的生计问题。因此,对于参与红军伤病兵救护的一些比较辛苦的、付出时间较多的工种如担架员、运输员等,根据地政权会给予一定的补贴。1932年9月1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的第25号命令发布了《运输员担架员的指导待遇等办法》,它将担架员分为长期和短期两种,“长期担架员1月到3月的,一概随军工作,每天每人发草鞋费大洋1角5分,五天发一次,并得分伙食尾子,但其他零用费不发”;“短期,由地方发动来的短夫,就近担运伤病兵和战利品,在20天以下的,不发按日的草鞋费,但酌量发给运输时间中的所需草鞋钱”。<sup>[23]</sup>这是在艰苦的革命战争时期兼顾革命需要与群众利益的一种方式。

此外,一些根据地会在地方财政税负上对长期参与救护工作的民众给予一定的减免。如1932年4月8日通过的《赣东北省苏维埃政府土地税征收法》第十条规定:“凡属红军医院驻扎地附近各村组织救护队员,免其本人纳税(但须是固定的救护队员)”。<sup>[24]493</sup>1933年7月1日公布的《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土地税征收法》也作出了相同的规定。该规定在方志敏同志的《对于今年土地税征收法的解释》中得到了进一步的确认。<sup>[24]496</sup>这也是对群众参与红军医疗卫生工作的一种激励措施。

从总体上看,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和根据地政权在推动医疗卫生工作的过程中还是比较注意保护根据地群众利益的,但在各地具体的执行过程中,在动员群众的方式方法上出现了一些偏差。如永新县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在1932年8月28日发布的通令要求群众“须要做到随时随地有红军经过就得举行慰劳”,“对后方医院每月要有两次举行慰劳”,并以命令式的口吻直言“谁对这个工作忽视,

谁就应受到革命纪律裁判”,<sup>[5]52</sup>这就违背了群众自愿的原则。这种“对工农群众有用命令主义、强迫手段”,使苏维埃政府成为“衙门”的做法,在当时被认为是“最危险的脱离群众的办法”。<sup>[25]183</sup>又如,1935年1月22日,瑞西县苏维埃政府给各区乡的指示信要求群众要“热烈供养伤病员,竞赛宰杀鸡子和米粿烹饪与他吃,好似待寓生客一样”,并提出了“每个伤病员都要有一个火笼子”“每个人要有一床棉被”“每五天洗衣一次”“每三天洗澡一次”“经常热茶热饭招待”等具体规定,还要求各区“经常检查”。<sup>[5]215</sup>这些做法有一定的摊派性质,引起群众的反感,不利于群众积极性的发挥。“依靠群众”是以群众的自愿为前提,要注意动员群众的方式和方法。如1930年12月11日闽西苏维埃政府《发动群众在新历年关慰劳伤病红军》通告,充分阐述红军伤病兵的的伟大和贡献,以及慰劳伤病兵的重大意义,“号召”群众“自动”地以鱼、肉、蔬菜等送与伤病兵。<sup>[26]312</sup>这种方式既能达到宣传动员的效果,也使群众易于接受。

## 五 群众在卫生运动中直接受益

“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sup>[27]137</sup>疾病卫生问题是群众生活问题的重要内容之一。中国共产党在发动群众支持红军部队医疗卫生工作的同时,在根据地的卫生建设过程中也使群众从中直接受益。

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之前,各根据地就已经注意到了当地群众的卫生健康问题。如1931年9月6日《中共赣东北省代表大会关于苏维埃工作决议案》针对赣东北苏区群众的高疾病率和死亡率,要求各级苏维埃尽快增设卫生委员会或卫生委员,切实加强卫生运动,让普通的劳苦大众能够“自己起来注意个人的和公众的卫生,以减少疾病和死亡”。<sup>[28]297</sup>又如1931年10月30日《万载全县工农兵第二次代表大会卫生问题决议案》为改变万载农民对于卫生“丝毫不懂”、县区各机关“亦是完全忽视”的状况,将卫生运动确定为“迫不容缓”的任务。<sup>[9]3</sup>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面对苏区的防疫现状和富田地方已有瘟疫发生的现实,1932年1月12日,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第四次常会“为保障工农群众的健康和预防瘟疫发生起见”,<sup>[5]35</sup>决定举行全苏区防疫卫生运动。1932年1月13日,《红色中华》社论刊登了项英的《大家起来做防疫的卫

生运动》,明确指出瘟疫问题是关系群众健康和革命力量的重大问题。<sup>[29]</sup>1933年2月13日,《红色中华》社论再次发表题为《加紧防疫卫生运动》的文章,提出通过组织群众卫生委员会和设立义务劳动日,形成讲求卫生的“极广泛的群众运动”,使“每个群众都能自己管理自己”,“每个群众都能注意到别人”。<sup>[30]</sup>通过上述对群众的宣传和发动,防疫卫生运动逐渐成为苏区经常进行的活动。同时,《卫生运动纲要》也直接指明了群众的健康利益是苏区卫生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它认为,国统区医院的门不是为工农而开的,国民党政府一方面盘剥工农大众的辛勤劳动,另一方面“却不把一文用到工农身上,只是忙于进攻苏区,却没有闲工夫给工人农民半点卫生常识”。苏维埃政权下的卫生运动“完全是广大群众的,不花钱而能治病的”。<sup>[5]70-71</sup>

在不断的宣传发动下,根据地的群众卫生运动有了很大的发展。“红军共产党什么都想到了”,“政府工作人员真正顾乐(爱惜的意思)我们”,<sup>[31]320-321</sup>群众感受到了党和根据地政府的关怀。乡村中也出现了卫生方面的自律规约,如1933年4月长冈乡塘背村的《卫生公约》围绕“坚决消灭疾病,开展卫生运动”的主题,从环境卫生、个人卫生、饮食起居三个方面对村民的日常行为进行规范与引导,力图形成卫生习惯。<sup>[5]78</sup>这些今天看似平常的规定,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农村不能不说是群众卫生习惯的一大变革,这是党和根据地政权推进群众卫生运动的重大成绩。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和根据地政府在医疗卫生工作中较好地发动群众,这是红色政权在当时极端恶劣环境下能够解决伤病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钱信忠在回忆红二十五军的卫生工作时总结了红军医院伤病员治愈率较高的四个原因:“一是苏区人民非常关心伤病员,虽然生活条件很差,但苏区人民常把家里仅有的一些粮食食品送给伤病员;二是把伤病员分散住群众家里时,群众对待伤病员亲如家人,胜过家人;三是部队经常转移,由于部队和群众的关系密切,因此,伤病员的转移都能及时得到群众的帮助;四是苏区发展很快,人民信任红军,即使是在斗争最艰苦的时期,群众坚定地相信,红军必然会取得胜利。”<sup>[32]456</sup>根据地群众对医疗卫生事业的支持,其动力一方面来源于对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属于广大工农的革命事业的认可与追随,另

一方面也来自于红色政权为民惠民的切身体验。

发动群众,“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sup>[33]467</sup>卫生与健康问题是任何群体都会密切关注的问题,这也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医疗卫生领域能够并必须践行群众路线的一个重要原因。其时,群众路线在医疗卫生领域的实践过程中,将“医疗卫生需要群众”和“群众需要医疗卫生”作为动员的出发点和立足点,通过有目的有组织的发动,不断发掘群众力量,并以制度化方式有序推进。在这一过程中,真心为群众着想,切实维护群众利益,使群众在卫生运动中直接受益,成为撬动群众热情的真正杠杆。这也是当时其它领域群众动员过程中努力求索的重要问题。

###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87.
- [2] 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M]//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3] 陈毅.关于朱毛红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M]//陈毅.陈毅军事文选.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6.
- [4]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
- [5] 高恩显,高良,陈锦石.新中国预防医学历史资料选编(一)[G].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1986.
- [6] 佚名.富田一带可怕的传染病发生[N].红色中华,1932-01-13(4).
- [7] 赣南医学院苏区卫生研究中心.中央苏区卫生工作史料汇编:第1册[G].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2.
- [8] 李朱.群众路线大家谈[M].北京:华文出版社,2013.
- [9] 陈明光.中国卫生法规史料选编(1912-1949.9)[G].上海: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1996.
- [10] 傅维康,傅维璋.傅连璋诞辰100周年纪念集[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4.
- [11] 韩世瑞,胡谷华.闽东苏区的卫生工作情况[G]//高恩显.新中国预防医学历史资料选编(一).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1986.
- [12] 戴济民.红色第一分院[G]//高恩显.新中国预防医学历史资料选编(一).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1986.
- [13] 邱林忠.朱毛红军与闽西革命[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3.
- [14] 中共长汀县委党史工作组.四都红军医院的成立经过及成绩[G]//高恩显.新中国预防医学历史资料选编(一).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1986.
- [15] 方志纯.对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闽浙赣苏区交通运输工作的回忆[G]//江西财经学院经济研究所,江西省档案馆,福建省档案馆.闽浙赣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选编.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88.
- [16] 党史资料征集协作小组.湘赣革命根据地:下册[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1.
- [17] 董洪国.红军三十军军医院工作回忆[G]//高恩显.新中国预防医学历史资料选编(一).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1986.
- [18] 徐立清.一切为了伤病员:红四方面军总医院工作的片段回忆[G]//高恩显.新中国预防医学历史资料选编(一).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1986.
- [19] 李瑞明,赵德荣.红四方面军总医院的组建和概况[M]//高恩显.新中国预防医学历史资料选编(一).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1986.
- [20] 佚名.十二军医处的医生充满了军阀军队的陋习[N].红色中华,1932-09-6(8).
- [21] 佚名.一个信基督教的医生傅连璋氏在中国红军内十年的经验[N].人民日报,1949-06-21(1).
- [22] 佚名.蓬蓬勃勃的中国苏维埃运动[N].红旗周报,1932-06-01(50).
- [23] 佚名.运输员担架员的指导待遇等办法[N].红色中华,1932-09-20(8).
- [24] 江西财经学院经济研究所,江西省档案馆,福建省档案馆.闽浙赣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选编[G].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88.
- [25] 中央档案馆,福建省档案馆.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7)[G].馆存本,1984.
- [26] 中央档案馆,福建省档案馆.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4)[G].馆存本,1985.
- [27] 毛泽东.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M]//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28] 江西省档案馆.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G].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
- [29] 项英.大家起来做防疫的卫生运动[N].红色中华,1932-01-13(1).
- [30] 社论.加紧防疫卫生运动[N].红色中华,1933-02-13(2).
- [31] 毛泽东.长冈乡调查[M]//毛泽东.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 [32] 钱信忠.红二十五军的卫生工作[G]//高恩显.新中国预防医学历史资料选编(一).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1986.
- [33]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责任编辑:黄声波